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7

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中国1980—2010年的经验分析

李湘黔, 孟斌斌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长沙 410073)

摘要: 从传统凯恩斯主义、国防相关行业的劳动力报酬、国防开支具体结构、国防开支挤出效应等方面探讨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相互影响的经济学理论机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财政挤出效应、军事人员生活费、军工市场装备费、军人户籍、转业政策、国防研发、军事技术溢出效应、边远军事基地的区域拉动效应等方面分析中国国防开支改善收入差距的潜在作用机理。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1980—2010年中国国防开支和基尼系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国防开支不构成引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差距。要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理顺国防开支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机理,更好地发挥国防开支的福利效应。

关键词: 国防开支; 收入差距;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5)03-0123-08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全球,日益扩大的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各国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两大重要且又相互关联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投入到国防领域的资源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两个一百年目标”和“强国梦”都迫切要求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安全和发展是国家两大基本战略目标,在国家战略全局中,是共生共亡、枯荣与共的关系,也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基本手段是协调“两大建设”战略目标,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姜鲁鸣,2013)^[1]。国不富,不是小康社会;富而不均,也不是小康社会;军不强,无法为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军强而国不富,不是小康社会;军强国富而民不均,也不是小康社会。国防开支是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国防建设是强军的基本经济活动,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社会收入差距是衡量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方面。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必须把握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客观规律。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不容乐观。穷人太穷,富人太富,中产阶层尚未形成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格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基尼系数在1995年达到0.415,2001年上升至0.447,超过国际警戒线0.4,在全球排名第35位(世界银行,2005)^[2]。根据《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2010年基尼系数达到0.438,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以0.1的百分点连续提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郭少峰,2012)^[3]。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的份额高达50%。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的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并且城市居民的金融资产已经呈现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从户均拥有金融资产的指标来看,最高的2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已经占城市家庭金融总资产的66.4%。而最低的2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只占总资产的1.3%(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3)^[4]。《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银行,2012)^[5]指

收稿日期: 2014-03-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国防建设资源配置与管理研究”(09ZD06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军民融合背景下军费投向量及优化研究”(11BJY134);2013—2016年度博士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李湘黔(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emaillxq@163.com;孟斌斌(1987—),男,博士研究生,E-mail:dreamenger@gmail.com

出,中国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 10%的家庭储蓄率为 60.6%,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 74.9%;收入最高 5%的家庭的储蓄率为 69.02%,其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 61.6%;收入最高 10%的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 86.69%。在城市,这一比例更高,达到 89.50%。数据显示,中国家庭财富占有的贫富分化程度在进一步发展(沈卫平,2012)^[6]。据有关专家估计,2009 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人数达到 67 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过 10 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名列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有 1.5 亿人口每日收入不足 1 美元,属于绝对贫困。有 31%的人口即 4 亿多人口每日收入不足 2 美元,属于穷人(周新城,2003)^[7]。

国防开支是保证一国国防能力的资源,是抽象意义上一国国防能力大小的经济衡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了国防领域(孟斌斌,2013)^[8]。一方面,国防开支所产生的国防能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国防开支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存在着与民生相关支出的竞争关系,势必挤出一些改善收入差距的资源。图 1 中数据较为生动地刻画了该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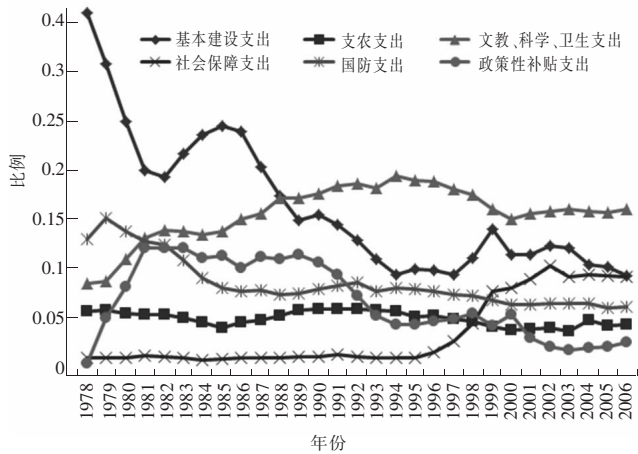


图 1 国防支出及财政相关项目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

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二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很少。尽管有关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是关于收入差距和国防开支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即使是国外也处于起步状态,目前还没有公开出版的文献对于中国的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当考虑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容易出现这样一种较简单的论断“由于国防开支属于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孟斌斌,2011)^[9],势必挤出可用于

再次分配的财政资源,扩大了收入差距”。而事实上,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为了破除这样简单、直接的论断,科学把握规律,总结经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国防资源配置,本文采用修正城乡加权法的基尼系数和调整了的国防开支数据来研究二者的关系,并结合中国国防建设的实践对模型结果进行经济解释,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与国防开支相关国防建设活动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

二、文献综述

很多文献研究了收入差距与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Willam Parish(1996)的“反分层化现象”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是相当平等的^[10];而 Victor Nee,Ivan Szelenyi 等(1994)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再分配机制不仅仅没有改善收入差距,反而加剧了收入差距^[11]。库兹涅兹为代表的倒“U”形曲线理论认为,在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上升,当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之后,由于福利政策和税收制度的再次分配调节作用,收入差距才会逐渐的缓和。而 Akos Rona-Tas(1994)等认为,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初期,收入差距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下降,并归纳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平等化效应消失,收入差距拉大,即正“U”形曲线理论^[12],进一步地研究细化了前面的争论。Gradstein(2001)认为,民主能够减小收入差距^[13]。Lipset (1993)^[14]和 Diamond (1992)^[15]认为财富与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关联。Rodrik (1999)认为,民主水平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制度对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影响^[16]。Dinardo(1996)认为,“去工会化”是美国 1979—1988 年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17]。Blau(1996)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制度特征,尤其是工资决定机制的相对分散化,对于美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工资不平等有着很大的解释力^[18]。

从机会不平等的角度研究收入差距取得了一些成果。吴敬琏(2010)提出,在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获取机会上不平等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行政腐败和对资源的垄断已经成为贫富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19]。王小鲁(2010)认为,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中国经历了过去 30 年经济体制改革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严重滞后^[20]。这种与资本相结合的权力结构,最终会将社会引向发展停滞和严重的危机之

中。进一步,桂林、陈宇峰、尹振东(2012)从权力寻租的视角把机会不平等推向对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权力的设租、寻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21]。

对收入差距与国防开支之间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具有冲击作用,国防开支增加,使得可以用于增加社会福利的资源减少(Dunne, 2004)^[22]。1988—2002年之间,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不断降低,与此伴随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人均国防开支持续增加,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增大(Smyth and Nara, 2009)^[23]。Ali(2007)通过研究国防开支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国防相关产业的工资较高,国防开支的增加使得国防相关产业的需求增加,这就导致一部分原来不属于军工行业的低收入工人也进入军工行业,这些低收入人群获得了比原来工资更高的工资,从而改善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降低了收入差距。Ali(2007)采用15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国防开支是决定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因素^[24]。Adem(2012)采用1963—2007年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国防开支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鉴于中国还没有关于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本文借鉴Adem(2012)的研究框架^[25],展开对于中国1980—2010年之间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

三、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

(一)理论基础

关于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二者关系,理论界没有统一的结论。从理论上讲,二者之间可能的联系可以从以下4个角度来看待:(1)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国防开支作为政府支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拉动总需求,提高经济中的就业。相对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从这种经济的拉动中获益较多。所以,国防开支的增加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2)从微观理论来讲,国防及国防相关的行业的劳动力报酬要比其他部门高,所以国防开支的增加加剧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3)国防开支的具体结构很复杂,因此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当国防开支用于支付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时,就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相反,当国防开支用于支付相对熟练的劳动力时,就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4)国防开支的挤出效应。国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再次分配,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而国家的财政预算是有

限的,国防开支作为财政预算的一部分,势必会挤出本来可以用于缩小贫富差距的转移支付的资源,使得收入差距扩大。

(二)现实分析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防建设的实践来看,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的作用机理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理论所归纳的几部分,其具体情况更为复杂,上面描述的理论规律在中国现实中哪些发生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本文先总体介绍中国国防开支的基本构成及收入差距的总体情况,然后展开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二者关系的论述。

根据《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国防开支主要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人员生活费用于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和聘用人员的工资津贴、住房保险、伙食被装等。训练维持费用于部队训练、院校教育、工程建设维护以及其他日常消耗性支出。装备费用于武器装备的研究、试验、采购、维修、运输和储存等。国防费的保障范围包括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同时也负担部分退役军人、军人配偶生活及子女教育,支援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等社会性支出。

中国的经济分层差距的变迁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79年改革以前的阶段和1979年改革以后的阶段(李强1997)^[26]。这里的经济分层与收入差距的含义一致。总体上,前一阶段收入差距小,后一阶段收入差距大。本文研究的数据起点是1980年,涉及后一阶段。该阶段的总体特点是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在总体介绍了国防开支和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下面对二者的相互作用进行论述。

财政挤出效应。从总体上来讲,国防开支是财政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形成的。国防开支受国家财政的制约,与“三农”、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存在着“彼消此长”的关系。在一定的财政收入规模下,国防开支的增长是以民生支出的降低为代价的。在中国的收入分配中效率和公平是两个重要的因素,初次分配往往是效率优先^①,因此,再次分配对于降低收入差距、增强公平具有重要作用。国防开支的财政挤出,使得可以用于降低收入差距的再次分配资源降低,以此为基础,可以得出国防开支降低收入差距的结论。

人员生活费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①文中所指的经济政策都是特指研究所涉及的时间区间内的政策。

在本文分析的时间跨度内,中国基本处于向机械化转型的过程中,军队人员中高中毕业、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的人员所占比例不容忽视。这些低技能劳动力在服役过程中按照社会平均报酬获得收益,该收益往往比其在军队之外工作的收益要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防开支的人员费改善了该部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收入差距。

装备费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该作用是通过军工企业间接产生的。在中国装备采购体制下,一直以来,中国装备的提供方主要是行政色彩很浓厚的军工企业^[27]。装备的研究、试验、采购、维修等都是由军工企业负责,装备费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军工企业的收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些军工企业通常背负着很大的行政包袱,要承担很大的社会职能。很多本应该下岗的低素质职工,由于政策的需要,仍然继续由军工企业负责,这造成了军工企业的冗员低效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军工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和政策包袱,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降低了收入分配不均。因此,装备费通过军工企业间接改善了收入差距。

军人户籍及转业政策是二元体制的突破口,降低了收入差距。在户籍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处于二元经济的格局。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军人户籍的特殊性,保证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军人不受户口制度的限制,可以在城乡自由流动,形成了其独特的突破二元结构的人才交流渠道。这使得城乡青年都有机会在同一个舞台中竞争。并且在中国的传统宗亲文化中,个人的发展会带动家属亲戚等圈子(如家属随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该机制对于人才流动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来看,军队转业人员的技能效应,军人的模范作用、思想观念的传播等都会成为改善收入差距的因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当兵几乎成了农村青年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途径,也确实有很多农村青年通过当兵的途径,走出农村,在大城市发展。这种独特的二元经济下开辟的唯一流动渠道,赋予了低收入群体更好的发展机会,降低了机会不公平程度,改善了收入差距。

国防研发、军事技术的溢出效应。武器装备是高新技术的物化,高新技术是生产力提高的推动力,国防研发所产生的技术成果不仅可以提高武器装备性能,并且往往对社会民用生产力的提高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肖裕声(2003)认为,1983年转移军民技术400项,1984年转移8000项,成交额4.3亿,1985年转移20000项,成交额10亿。技术的发

展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财政收入随之提高,可用于改善收入差距的资源增加,从而降低收入差距^[28]。

边远军事基地的区域拉动效应。军事基地由于其特殊的国防属性,很多都建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军用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医院等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军事基地还可以为当地经济制造需求,增加就业。三线建设是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分布格局,降低了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三线建设的项目“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尖端项目“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进洞。”在很多发展落后的地区形成了一大批相对当地发展水平较先进的国有企业,极大地推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降低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新疆建设兵团、海南农垦和黑龙江农垦等也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与古代“屯边”的思想相接近,既完成军事任务又促进经济发展。研究表明,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李实、赵人伟,2007)^[29]。国防建设的这一系列部署,都极大地带动了落后地区的发展,从而缩小了整体收入差距。

当发展处于“市场社会”阶段,即使国防开支较少,政府也不会把所减少的资源用于改善收入不公。Karl Polanyi(1944)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经历“伦理经济”“市场社会”到“社会市场”^[30]。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必然也经历这样的阶段。在中国转向市场社会时,经济试图脱嵌于社会,并进而支配社会。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社会演化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市场会“脱嵌”于社会,这个时期,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分配公平。研究表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一直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正体现了这一论断(王绍光,2008)^[31]。

综上所述,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当然,收入差距要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但这不妨碍笔者进一步研究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所存在的联系。由上可知,国防开支既有降低收入差距的因素;又有增加收入差距的因素,现实是复杂的。到底哪一种作用为该时期的主旋律,下面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该疑问进行解答。

四、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关联。为了达到该结果,采用 Engle-Granger(1987)提出的两步法(Two-step procedure)。假设有两个随机时间序列 X 和 Y 。Granger(格兰杰因)方法通过计算 X 变量的滞后值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 Y 变量的当期值,来揭示 X 是 Y 的“Granger”, Y 是 X 的 Granger 果(即 X causes Y)。也即如果 X 有助于预测 Y 的值,那么 X 是 Y 的 Granger 因。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如果在 Y 对 X 回归的结果中, X 的滞后项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那么 X 是 Y 的“Granger 因”。

第一步,平稳性检验。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确定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

第二步,协整检验。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两个序列是否协整。

$$DE_t + \alpha_0 + \beta_0 INEQ_t + \mu_t \tag{1}$$

$$INEQ_t + \alpha_1 + \beta_1 DE_t + \mu_t' \tag{2}$$

其中, α_0 和 α_1 是常数; μ_t 和 μ_t' 为误差项。

第三步,Granger 因果检验。采用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 基于变量的误差项之间系数的显著程度,进行 Granger 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不再是仅仅利用变量的水平值或变量的差分建模;而是有机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数据的信息。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Delta DE_t = \alpha_0 + b_0 \mu_{t-1} + \sum_{i=1}^m c_{0i} \Delta DE_{t-i} + \sum_{j=1}^n d_{0j} \Delta INEQ_{t-j} + e_{1t} \tag{3}$$

$$\Delta INEQ_t = a_1 + b_1 \mu'_{t-1} + \sum_{i=1}^q c_{1i} \Delta INEQ_{t-i} + \sum_{j=1}^r d_{1j} \Delta DE_{t-j} + e'_{1t} \tag{4}$$

其中, μ_{t-1} 和 μ'_{t-1} 是残差的滞后项,残差是由协整检验中方程(1)和方程(2)回归所得;“ Δ ”表示差分,通过对变量进行差分使得时间序列数据满足平稳性。根据误差修正模型,如果两个变量协整,那么在两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如果 b_0 和 b_1 统计上显著,那么时间序列 DE 是 $INEQ$ 的 Granger 因; $INEQ$ 是 DE 的 Granger 果。

(二)数据

国防开支数据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借鉴刘涛雄和胡鞍钢(2005)的方法对数据进行调整^[32]。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自田卫民(2012)利用 Thomas、Wan 和 Fan(2000)提出的“非等分组”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计算出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33],

在此基础上结合 Sundrum(1990)“分组加权法”和李子奈(2004)“修正城乡加权法”^[34],计算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1980—2010 年。

五、结果与讨论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检验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首先根据 Phillips-Perron (PP) 法采用 MacKinnon(1996)单边概率估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表 1 列出了时间序列数据的 PP 检验值以及检验“存在单位根”这一原假设时相应的 p 值。检验结果显示,在各种情况下,国防开支数据和收入差距数据均不平稳,其相应的一阶差分数据则都是平稳的。这说明,二者均为同阶单整,其阶数都为 1。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不含趋势项和漂移项	含漂移项	含趋势项	检验结果
DS	0.983 2	0.987 7	0.751 4	不平稳
$INEQ$	0.931 9	0.844 8	0.232 6	不平稳
$D(DS)$	0.000 1	0.000 3	0.000 7	平稳
$D(INEQ)$	0.000 2	0.002 2	0.012 5	平稳

(二)协整关系检验

DE 和 $INEQ$ 均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运用 Engle-Granger 两步法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先估计体现国防开支和收入差距两组数据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回归残差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得出国防开支和收入差距两组数据之间存在一阶协整关系 $CI(1,1)$ 的结论。这说明,国防开支数据和收入差距数据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 2 回归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不含趋势项和漂移项	检验结果
残差	0.111 3	平稳

(三)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国防开支数据和收入差距数据存在一阶协整关系 $CI(1,1)$,对二者的因果关系不能通过 VAR 模型而应该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方程(3)和方程(4)。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Granger 因果检验

原假设	F 统计值	p 值
国防开支不是收入差距的 Granger 原因	0.045	0.833 4
收入差距不是国防开支的 Granger 原因	2.185	0.150 9

计量结果无法拒绝“国防开支不是收入差距的 Granger 原因”,而在 15%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收入差距不是国防开支的 Granger 原因”,因此,收

入差距是国防开支的 Granger 成因,即收入差距引领国防开支,反之,国防开支并没有引领收入差距。计量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国防开支数据与收入差距不平等数据之间存在单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这个数据否定了理论探讨部分“国防开支挤出财政支出而扩大贫富差距”的观点。然而,长期的均衡关系所反映的经济含义在短期并不一定成立。

(四)误差修正模型

传统的经济模型通常表述的是变量之间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而实际经济数据却是由“非均衡过程”生产的。因此,可以用数据的短期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

为了检验国防开支数据与收入差距数据之间的短期关系,按照方程(3)和方程(4)进行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能够反映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回归滞后项根据 AIC 准则来选取。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反映了变量之间从短期的不均衡状态向长期的均衡状态调整的力度,称为“误差调整系数”。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短期变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因变量波动的影响;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

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843 2。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843 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说明两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仅在长期成立,在短期仍然成立。从短期来看,被解释变量的变动是由较稳定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所决定的,短期内系统对于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的大小直接导致波动振幅的大小。从长期来看,协整关系式起到“引力线”的作用,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五)脉冲响应

在 VEC 模型估计的基础上计算脉冲响应函数。对 DE 一个标准差的冲击迅速影响当期及之后的 DE 且持续时间长,10 年之后的响应幅度仍然显著; $INEQ$ 的响应程度逐渐增大,4 年之后趋于平稳状态,不再增加。对 $INEQ$ 一个标准差的冲击, DE 的响应逐渐增大,4 年后趋于平稳状态,不再增加; $INEQ$ 的响应当期达到最大值,逐渐减小,5 年之后达到最小,之后趋于平稳状态。可见二者之间存在反向的影响关系。

六、结论

目前,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关于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之间互动关系的成熟理论模型。本文采用协整分析和 Granger 因果检验,研究了二者之间可能

存在的关系。

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滞后期的收入差距数据能够有助于解释当期的国防开支数据,收入差距是国防开支的 Granger 原因,说明国防开支并没有因为挤出效应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一方面与中国国防费本身规模合理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社会从“经济社会”到“社会经济”的转型有关。

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国防开支的增加会降低收入差距。数据分析验证了前面的猜测,可见,现实中国防开支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作用占主导地位。国防开支中有一部分资源确实改善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降低了收入差距。从中国军队人员的整体知识技能综合水平来看,其中存在着有一部分低素质人群,这些人如果是在其他部门,可能很难获取在军队服役期间的收入,这个机制通过人员维持费来传递。该费用接近国防开支的三分之一,再考虑到20世纪军队高学历人员比例比较低,低收入能力人群的比例相当可观,因此通过该机制降低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可忽视;国防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用来采购军工企业所生产的装备,一直以来军工企业都属于经济体制改革中较为保守的部门,其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且一直以来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不能够按照效益来解雇不需要的职工,还要承担高额的养老、退休等保障功能。国防开支中的采购费用通过军工企业发挥社会职能,增加了低收入能力人群的收入,降低了收入差距。另外区域效应、技能效应等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收入差距增加时,会使得国防开支降低,这体现在财政部门等决策部门在面临较大的收入差距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于改善分配不平等的开支之中,从而使可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降低,国防开支降低。

决策部门在考量国防开支时,不仅要考虑到满足“国防需求”这个因素,也应该考虑国防开支的经济效应,尤其是对于收入差距的这种改善效应。面对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局势和安全需求的不断增加,要能够善于把握二者的关系,优化国防开支的结构,理顺国防开支的渠道,使得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防开支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能够继续更加顺畅地发挥,从而更好地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深化军民融合发展路子,更早实现富国与强军,实现强军梦和中国梦。具体来讲,在相关决策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的方面。

1.更好地利用国防开支需求。拉动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对收入差距的改善效应。往往在经济周期的

低谷,国家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资,促进经济上升。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于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从这种经济的拉动中获益较多。在国防开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投资支出,在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注重理顺相应的渠道,使该机制可以更好地发挥效用。

2.注重国防开支的合理安排。通过人力资源渠道改善收入差距的机制。国防开支用于支付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时,就可以缩小收入差距。一些国防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某些类型军事活动,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就应该使用相应素质的劳动力,释放高素质的劳动力使之去从事更高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活动。对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使得人尽其才,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可以改善收入差距。

3.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注重通过国防工业布局改善地区发展差距,从而降低收入差距。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国防工业布局变化的大背景。国防建设过程中,尤其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过程中,也存在相关

国防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国防工业基础整体布局会随着国防建设的要求而演化,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进行理性的构建与引导,在顶层设计中统筹国防与经济两方面,发挥国防建设的经济效益,尤其是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效益,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更好更快地建成小康社会。

当然,研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国防开支仅仅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方法来研究二者的关系。中国基尼系数数据能否反映真实的收入差距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然而,本文旨在达到以下目的:第一,破除“国防开支导致收入差距”这种不准确的观念;第二,详细分析国防开支改善收入差距的渠道及机理,为更好地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通过本研究为学术界提出一个全新的现实问题,为以后采用其他方法研究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奠定了基础。通过经济模型的构建进一步分析国防开支改善收入差距的机理,及对该影响的机理进行经验分析,是以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姜鲁鸣. 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N]. 解放军报,2013-05-07(7).
- [2] 世界银行. 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
- [3] 郭少峰. 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正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N]. 新京报,2012-09-15(4).
- [4] 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 财政部报告称中国贫富分化加剧 [EB/OL]. (2003-06-16)[2012-02-25].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jingji/347322.htm>.
- [5] 甘梨.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2012[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6.
- [6] 沈卫平. 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J]. 现代经济探讨,2012(11):29-33.
- [7] 周新城. 关于分配问题的若干思考[J]. 理论学刊,2003(3):44-50.
- [8] 孟斌斌.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军民融合[J]. 工业技术经济,2013,32(1):141-145.
- [9] 孟斌斌. 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效应及规模效应的分析[J]. 价值工程,2011(7):9-12.
- [10] Parish,Willam L,Michelson E. Politics and markets:dual transform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101:1042-1059.
- [11] NeeVictor,Ivan Szelenyi,Eric Kostello. An outline of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 Sociology. Cornell University,1994,110-156.
- [12] Rona-Tas Akos .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100:40-69.
- [13] Gradstein M,Milanovic B. Democracy and income inequality:an empirical analysis[C]. World Bank,Washington,DC.,2001:38-45.
- [14] Lipset S,Seong K,Torres J.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requisite of democracy[J]. International Social Journal,2003,45(2):155-175.
- [15] Diamond 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C]. Reexamining Democracy. Lodon:Sage.1992:93-139.
- [16] Rodrik D. Democracies pay higher wag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01(3):707-738.
- [17] Dinardo J,Fortin N,Lemieux T.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1973—1992:a semi-parametric approach[J]. Econometrica,1996,45(5):1001-1044.
- [18] Blau F,Kahn L.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male wage inequality:institutions versus market forc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104(4):791-837.
- [19] 吴敬琏. 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J]. 财经,2010(21):3-8.

[20] 王小鲁. 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J]. 比较, 2010(31):1-10.

[21] 桂林, 陈宇峰, 尹振东.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 权力寻租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2(9):140-151.

[22] Dunne P, Perlo-Freeman S, Soydan.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debt in South America[J].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04, 15(4):173-187.

[23] Smyth R, Narayan K.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the military expenditure external debt nexus: evidence from six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9, 46(2):235-250.

[24] Ali H.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global data[J]. Journal of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07, 18(6):519-535.

[25] Adem Y Elveren. Military spend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on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for Turkey, 1963—2007[J]. Journal of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2012, 23(3):289-301.

[26] 李强.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J]. 社会学研究, 1997(3):32-41.

[27] 孟斌斌. 政府采购合同设计与承制单位价格信息[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15(2):60-65.

[28] 肖裕声. 新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思考[J]. 军事历史, 2003, 12(3):28-34.

[29] 李实, 赵人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J]. 经济研究, 1999(4):3-17.

[3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112-115.

[31] 王绍光. 大转型: 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12(1):129-148.

[32] 刘涛雄, 胡鞍钢. 国防开支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评估的两部门外部性模型[J]. 清华大学学报, 2005, 45(12):1692-1696.

[33] 田为民. 中国基尼系数计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J]. 人文杂志, 2012(2):56-61.

[34] 董静, 李子奈. 修正城乡加权法及其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5):120-123.

Defense Expendi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or China, 1980—2010

LI Xiangqian, MENG Binb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possible theory causality mechanisms that defense expenditure may affect economic inequalit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r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Keynesian point of view, labor revenue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base, composition of defense expenditure, and crowding effect. Then,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case of China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the redistribution channel, the personnel expenditure channel, the army industry channel, the household register channel, the R&D channel, and the area regional economy channel. After that,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ense spend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for the period of 1980—2010. Utilizing basic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tests, we aimed to add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evidence that defense expenditure did not cause the income inequality for the case of China. China should bal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defense further to exert the economic welfare effect of defense spending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s under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Key words: defense spending; income inequality; granger causality

[责任编辑: 孟青]